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五四 ——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五出版)

---

本期目录 (zk0309c)

---

【人物追踪】江青最后十年	佚名
【史海钩沉】江青与林彪	杨银禄
【亡灵祭坛】田汉之死的人道反思	张耀杰
附：生不惧丑死求美——田汉的最后日子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人物追踪】

### 江青最后十年

• 佚 名 •

#### ◇ 自杀之谜 (1991年5月14日)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三月十八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同时轻蔑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她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争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五月十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五月十二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五月十三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五月十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虚弱的、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在铁架上。她用被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得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

三点三十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七十七岁的时候死去了。她的尸体重一百零四点七磅，比三月十五日进这家医院时轻了三点一八磅。

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五月十八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一九九一年六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导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导说，据六月一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六月四日晚十一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导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公告没有概括江青的一生，没有提及她曾官居高位，也没有提到她曾是毛泽东长达十八年（编者按：原文如此）的妻子。如果学校的孩子读到这则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角落里消息，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女人曾是毛泽东的夫人。

如果西方记者没有受到《时代》周刊这一未被证实的报导的刺激，而反复再三地向中国各官方机构提出江青命运的问题，这一消息可能永远也不会公诸于世。假如中国政府曾经决定宣布江青死亡的消息，而拖了几周才这样做，那就是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需要方面的考虑。另一种拖的原因可能正如香港一家报纸后来引用公安部来源的消息报导的那样，需要调查江青的死亡是自杀还是有其它原因。这家报纸写到：“政府高级官员指示说，在调查结束之前，不要公诸于众。”

中国官方公布的消息称，江青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一直是保外就医，事实上，在这个日期之后三个月，司法部一发言人还说，江青年初曾提出希望离开监狱改为监外服刑的请求被驳

回，一九八八年，官方新闻媒介几次提到江青仍在狱中服刑。一九九一年一月，一份大陆报纸在报导江青的近况时还说：“她被关在一间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房间装上特制窗户，以便透进光线，同时，警卫也可以看到她，而她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无论江青从监狱到医院，还是到软禁，这中间是怎么来回转换的，说她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起一直就是“保外就医”，这是不确切的。

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一九七六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一九八四年九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一九八六年五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绝望，对自己的咽喉癌，以及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这种心情同时又受到负责她这一案件或看守她的人的刺激。除此之外，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已经在精神上做了准备，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等个人的政治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无前途，因而走上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

#### ◇ “住口，江青”（法庭审判——1980年末）

江青关在秦城监狱。一位曾在此服过刑的犯人说：“那里没有人，只有阎王和幽灵”。在这里，犯人被单独关押，不给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杀。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底，绝望的江青企图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脑袋往墙上撞。但是，在她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再加上门外窥视口的不断监视，粉碎了江青的自杀企图。江青爱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还是肉馅的，她都喜欢。一天晚饭时，江青偷偷地把两个肉包子塞进袖子，准备留作夜宵吃，被看守发现，看守她的警卫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现在吃的。”江青羞愧万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处。江青醒悟到，她将面临一场“三堂会审”，是一种京剧式的审判，其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复仇。她向检察官指出：“我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了，我只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有另一个角色是被告，仅此而已。”检查官们走后，江青浏览她收到的材料，她注意到，“四人帮”的排名是：王洪文第一，张春桥第二，她第三。她对警卫喊道：“为什么我不是第一？”

在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一年，陈云接管了江青的案子，四十一年前，江青在延安设法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时，陈云与她谈过话，接下来是彭真在一九八零年夏负责对江青作审判前的讯问，彭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对手，江青现在呆的地方就是他当时的牢房。

“被告江青在一九七四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当副总理”。这是十一月二十六日，特别法庭终于开庭。三十五位法官及六百名特邀代表正襟危坐，地点是坐落在北京正义路的中国公安部礼堂。江青身穿素色套装，依然镇定自若，从笼子似的被告席围栏里可以看见她的手，指头在从容地活动着，一张一合，帮助她放松下来。她在控制自己。她的策略是保持“尊严和理智”；这第一条指控是容易推脱的——中国人民肯定能理解政治斗争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区别。

一个证人出来作证。“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这个人哭丧着脸答道：“江青下的指示。”这个证人就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小三十二岁，他要想着未来，所以背叛了江青，承认了一切指控。江青静心听了一会儿年轻同伙的诉说，翻起白眼瞪着王洪文。王洪文作证时，她大喊要去厕所，审判中断一会儿后，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这时，江青那种当王当主子的态度忽然又闪现出来，她吼道：“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作为江青反邓小平和周恩来活动的证据，张玉凤写的证词在法庭上读了，当检查官宣读张玉凤写的“四人帮”极力要挟毛的证词时，江青坐得笔直，盯着前面、方正、白净的面孔像一座雕塑。张玉凤没有到庭。

毛泽东晚年的两位年轻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这时，江青开始对她表现必须良好的许诺犹豫不决了，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江青挤眉弄眼，嘴撅得老高，歪着脖子，盯着天花板。王海容也发言说：“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江青喊道：“我要发言！”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江青大步走进法庭。她抚平衣服，理理头发，弯腰坐椅子上。每位公诉人和证人面前都放着一杯茶，而江青面前只有一排麦克风。公诉人一再声明，江青要对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夫人被囚禁十二年负主要责任，每个证人都带来一大批对江青不利的证据。

证人中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曾在狱中呆了六年。“我要发言！”江青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住口，江青！”六名法官异口同声地喊道。公诉人拿出有利的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寻找他们“犯罪”的材料。江青摘下眼镜放在右手中一挥，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她向法庭反问：“抄他们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她不顾一切地接着又说：“破四旧（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八月下达的一项指示）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检察长黄火青说，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大代表未经全国人大或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不受逮捕或审讯。那么，你江青有什么理由剥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自由？江青仰头靠在椅子上，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当公诉人提到她三十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时，江青像只熊一样蜷缩着，盯着椅子。过后她又跳起来，“这些反革命活动是什么？”她对着法庭咆哮着。法官没有说话。当然，空气中的火花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她作为“蓝苹”的私生活点燃的。江青想保持“冷静”和“尊严”的打算落空了。五次开庭把她拖垮了。在等待下次出庭时，江青决心把毛当作她的辩护的靠山。

“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江青透过她的金属眼镜框盯着这位法庭庭长。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一会儿之后又冷静下来。“可以，你问吧。”“法庭是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把她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法官们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当她讲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江青投出一颗炸弹。“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上又是大乱。江青在叫嚷中又吐出一个信条：“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礼堂，这时听众们鼓起掌来。

#### ◇ 骚动的监狱生涯（1981—1990）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十名罪犯并排站在特别法庭上，像你笼中的困兽一般，聆听对他们的公开判决，张春桥和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其他人的判刑则较轻。

一周以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她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要写回忆录；二是要面见邓小平和华国锋。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会考虑的。他并告诉江青，必须干一些体力劳动。而江青则希望逃避通常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说自己很喜欢做布娃娃。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不反对。据监狱方面的人说：“她三天就能做一个布娃娃，样子很好看。她一边缝布娃娃，一边哼曲子。她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吃饭时还很有兴致地与女看守聊天。”

一九八一年底到一九八二年初，江青变得不太驯服。她拒绝写每月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查（王洪文在另一座监狱，他的检查总写的比要求的多），她开始在监狱的墙壁上写抗议的标语。有一天，她写的是：“不怕杀头。”看守们洗去标语，并警告她再不要这样做。第二天，她开始在自己制作的布娃娃上绣上她的名字，这样，她制作的布娃娃也就不能再出售，而是被一个一个堆在仓库里。

一九八三年一月，江青的两年缓刑期已满。尽管胡耀邦和彭真都曾在一九八二年对外界提过江青的强硬态度，中共还是宣布说（依据法律要求），对她认罪态度作了调查。“她不再公然反对改革”。于是，北京没有处死毛的夫人。

事实上，江青一直是拒不服从，她对一名看守说：“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要做的事。”

如果说江青没有什么遗憾的话，她同样也没多少可以期待的东西。她时常对看守发出抗议性批评，或者写信给她以前在政治局中的同僚。

一九八四年春，四十五岁的、离婚很长时间的李讷，来到秦城监狱看望她的母亲，并和她谈了自己准备再次结婚的打算。江青问：“这个人知道你是谁吗？”李讷回答说，她的男友王景清在军队工作，很清楚她的家庭背景。江青讪讪地：“你现在是双重身份，既是伟大的革命导师的毛泽东的女儿，同时又是最大的反革命江青的女儿。”

作为江青的女儿，李讷生活很不易，不过，在邓小平时期，李讷比她母亲的处境要好一些。王景清曾在中央警卫团工作，李讷她们结婚时，收到杨尚昆送来的一盒糖果和一条床单。

一九八四年，江青讲了一些关于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的好话。自她被捕八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谈到她的对手和这些八十年代中期的继承者，江青说：“邓小平、胡耀邦是讲道理的人，我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有答复。”江青通过女儿李讷对这些“讲道理的人”又提出新要求，而这个要求就不易答复了，她说：“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我想，最好能让我出去服刑。毛主席也不会把任何人关很长时间的。”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请求。同时，她还说：“要是能出狱，我想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座老房子里。那里空气新鲜。”听这口气，似乎她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结果这一请示遭到拒绝。但是，可能是因为胡耀邦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作出的决定，整个八十年代后期，江青在监狱外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一九八四年五月起，江青可能就很少呆在秦城监狱。她总是定期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和二零一医院治疗喉癌和其他疾病。还有可能一度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并有可能曾在李讷家中住过一段时间。

在江青的一生中，八十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她读书最多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书都取自她自己拥有一万册书的图书馆，由李讷带给她，现在，这些书都堆在李讷的家中。

◇ 八十年代后期，江青的造反精神似乎有所复活。

母亲和女儿经常争吵，当两个女人因互不满意而吵个不休时，李讷的丈夫王景清总是尴尬站在一旁。有一次江青要李讷给领导人写个便条，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当李讷说她不能这样做时，江青异常愤怒，咆哮着把李讷夫妇带给她的西瓜摔了一地：“连你都不管我了，没有良心。”江青似乎更喜欢李讷的丈夫王景清，特别让江青高兴的是，王与她一样，也是书法爱好者。她常常兴致勃勃地怀王景清谈论书法，而李讷则僵直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言不发。

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十二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宝座的迹象。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毛泽东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江青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得到允许，组织全家聚会来纪念这个日子。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听到要求被拒的消息，江青一口吞下五十多粒安眠药片。在毛泽东九十五周年诞辰这一天，他仍在世的亲属作了一次为数极少的公开露面，李讷、李敏和毛岸青（三人同父异母）分别携带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里——唯独没有江青。

一九八九年三月底，江青结束了软禁生活，重又回到监狱。因为咽喉癌需要接受治疗，江青时常乘坐一辆灰色的小货车往来于监狱和医院之间。医生建议她切除部份咽喉，遭到江青的断然拒绝。她害怕自己因此再也不说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江青都呆在监狱里。她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一篇带敌意的报导说：“监狱的看守发现她笑得很怪，便问她感觉怎么样，她一脸莫名其妙的说：“这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恢复软禁生活。听到这一消息，江青提出，要么回到中南海毛的故居，要么回到她七十年代的住处钓鱼台十七号楼。当两项要求均遭拒绝时，江青绝望地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说明她有自杀的想法，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陪同护士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江青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一九九零年初夏，《华亚》（H Y A Y A）杂志报导了江青的言论，说明她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感到后悔。《华亚》杂志还报导说，江青写东西的热情很高，当有人问她写作主题时，她会“狡黠地一笑”，然后嘲讽地说：“等着瞧吧！”

一九九零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江青母女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冷淡，李讷夫妇去看望江青的次数和同她呆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前都少。

江青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悔改迹象。一九九零年七月，一份限于《人民日报》记者内部传达的秘密文件说，江青依然密切地注视着政治的动向和人物的更替。文件说：“她野心不死。”

~~~~~

## 【史海钩沉】

### 江青与林彪

• 杨银禄 •

江青和林彪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他们是你来我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又是各怀鬼胎，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关系。

江青和林彪之间来往、请安的牵线人是林彪的老婆叶群，她是江青处的常客，我所知道的他们之间的人员来往以及电话来往，大都是请安问好方面的内容。例如：气候有较大的变化；一方或者双方身体感到不舒服；逢年过节；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的前后；离开北京到外地，或者从外地回到北京等时候，都要相互请安问好。像这类请安问好的内容，叶群大多是直接打电话给江青的秘书，请秘书转告江青，她很少直接打给江青，怕电话的铃声打扰江青。江青打电话或回电话给林彪的时候，也是通过她的秘书打给叶群，很少直接打给林彪，她怕电话的铃声打扰林彪。有关请安问好的电话，仅从1969年初到1971年9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就达470余次，平均每隔两天就要电话联系一次。

这种请安问好的原话无非是那么几句：林副主席身体好吗？请他多保重。你（指叶群）要把林副主席保护好，要防止受凉感冒。而叶群也总是回答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如一方知道另一方身体稍有不适，一方不仅电话问候，还会亲自到另一方住处去看望，以表示关心；一方从外地回到北京，定到另一方家中看望，以表示离别之后的想念之情。有一次林彪从外地回到北京，还没回他在毛家湾的家，就风尘仆仆地到钓鱼台看望江青。

那一次林彪亲访江青，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看样子林彪有很久没有理发刮胡须了。秃顶下边一圈的头发长长的，乱乱的，胡须白白的，长长的。我从未看见过他那副样子。就是这样一副样子，一向讲究的江青，一见到林彪仍旧高兴得眉飞色舞，握住林彪的手，久久不撒开，显得十分亲密。

江青知道林彪怕风、怕冷、好感冒，一年四季只要到室外脑袋就包得严严实实的。江青为此请人给林彪特别订做了一个貂皮围脖，并亲自送到毛家湾给林彪戴上。林彪高兴地拉着江青的手连连道谢，说：“江青同志政治上考虑得周到，生活上想得也很细致”。他并且指着江青对叶群说：“江青同志在这方面比你强得多。”

林彪和叶群知道江青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也特意给江青送去一台负离子发生器，是进口的。与此同时，林彪怕江青出楼门、下汽车被风吹着，伤风感冒，还叫叶群带上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和建筑房子的设计师到江青住的钓鱼台10号楼，看现场、选地点，给江青修建了一个直接通往楼内的汽车库。

党的九大以后不久，江青在10号楼对叶群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我对解放军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想抽时间到军营去走走。”叶群很机灵，马上从总后勤部找了裁缝，很快就给江青做了三套陆、海、空三军军服，并亲自送去，江青高兴得很，左试右试，十分欣赏。

林彪知道江青爱吃南方的西瓜和南方的水果，经常派人从海南岛给江青用飞机运来无籽西瓜，以及荔枝等水果，供江青享受，越是冬天天寒地冻时运得越勤。当然有时夏天也送。记得1971年9月8日，也就是林彪外逃的前几天，林彪叫叶群从北戴河打来电话给江青，叶群在电话里格外热情地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林彪同志今天给江青同志送去几个（4个）大西瓜，请江青同志尝尝。”

江青看了我记的电话记录以后，也立即叫我回电话说：“请林副主席放心，我现在身体还好，感谢林副主席的关心，也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

江青收到林彪送来的四个大西瓜舍不得吃，在钓鱼台10号楼的前厅放了四天，于9月12日下午，也就是林彪叛逃的前几个小时，江青特意带上这四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游玩，十分得意地对那里的干部、职工们说：“你们看，这几个大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

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让我们大家一起感谢林副主席。”江青这样做固然是因为对林彪准备叛逃一无所知，但这件事也足够让她出丑的了。

1971年6月初，江青叫谢富治给她找了一大块蓝色的幕布作背景，又从新华社借了8个灯具，在钓鱼台17号楼精心布置了一个照相室。6月9日，江青特邀林彪、叶群到钓鱼台照相。当时，林彪并没有思想准备，因为他连胡子都没有刮。江青为了给林彪照得好，使他满意，就把他带到10号楼刮胡子。林彪说：“年龄大了，有胡子没有关系。”不想刮。叶群忙劝说：“江青同志亲自给你照相，不刮胡子不好，刮了显得年轻，精神焕发。”江青也劝说：“你是党的副主席，解放军的副统帅，照的相应要有领袖气派。”两个女人都在劝说，林彪也就勉强同意刮了。

回到17号楼，林彪端坐着，江青调整好了焦距和灯光，马上就要按动照相机的快门了，突然又想出一个点子，说：“请林副主席把帽子摘掉，我想给你照一张免冠像。”

林彪的头顶光秃秃的，看样子他很不想摘掉帽子，但是，在那种场合又不好说什么，只好把帽子摘掉，扔给他的工作人员。

江青等林彪摘掉帽子，第二次准备按动快门的时候，突然又说：“我觉得这样照还是不够理想，没有林副主席的特点，林副主席最好是拿着一本《毛泽东选集》两手捧着，就像是在看书。”“还是江青同志想得周到。”叶群夸奖说。江青命令工作人员跑回10号楼把她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拿去，交给林彪。林彪被几个大灯烤得满头大汗，江青递给他一条毛巾擦了擦汗水，摆弄好姿势以后，终于按动了快门。

一个月以后，林彪的这张照片刊登在《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七、八期合刊上。江青给这张照片命题为“孜孜不倦”。1971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消息说：“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林彪的照片刊登以后，叶群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拍的照片太好了，它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如此看来，形像教育有时比文字教育更有影响力。林彪同志非常高兴，他感谢江青同志的辛勤劳动，也热烈祝贺江青同志的作品公开发表，我们也希望江青同志的其他作品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以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江青回电话说：“请林副主席保重，摄影艺术是一方面，主要是林副主席的形像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最高的代表。”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了。林彪及其一伙在会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当即加以制止并批评了他们。31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了陈伯达。

林彪集团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评以后，好像热锅上的蚂蚁。27日中午，陈伯达如丧家之犬，无精打采地来到江青的住地，用低颤的声音对我说：“小杨，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我想见见她，我有要紧的事想和江青同志说说。”

江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势利眼。陈伯达平时的口头表达能力较差，穿着也比较窝囊，江青在这些方面看不起他。但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江青是很佩服的。陈伯达原来是文革小组组长，她是副组长，“九大”以后，陈伯达是常委，她是政治局委员，总的来看，江青对陈伯达还是尊



重的。但是对于犯了政治错误，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处境十分困难的陈伯达，想见到江青也是很困难的。

江青听说陈伯达来了，又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谈，精神马上紧张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我，问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在会客室。”江青听了以后猛然站起来，嘴角哆嗦了几下，说：“他现在来干什么？你马上告诉他，我不见。”我转身准备走，江青又说：“你等一下，不能说我不见，你就说我现在还没有起床，请你先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再报告她，是她请你来，还是她到你那里去，我再打电话报告你。总而言之，你想办法把他支走就是了。”

就是在这天下午，叶群也急冲冲地来求见江青。我报告江青之后，她只是沉思。足足等了5分钟，才开口说话：“见不好，不见也不好，真使我左右为难，叶群这个人，嗨，不说了。”又等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顾不得那多么了，决定见，你请她进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她们的会谈结束了，江青打铃叫我送客。我看见她们二人肩并肩地走出办公室，在走廊上我听到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受感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江青说：“请你回去代我问候林副主席。”叶群习惯性地低头哈腰说：“一定，一定，谢谢江青同志。”

江青把叶群送走之后，立即调车到主席那里去了。江青回到住地时，情绪很不好，找我们工作人员发泄，直到汪东兴同志来了又走了，江青的火气才基本上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后我才知道，江青到毛主席那里，惹得主席不高兴。主席教训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庐山会议虽然结束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毛主席多次批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江青是知道的。但即使在这种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仍多次通电话。

1971年4月29日，叶群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

5月2日，江青给林彪打电话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

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叶群打电话给我，叫我报告江青，现在去看看江青行不行？我报告江青时，她说：请叶群同志来，这是我们昨天约好的。叶群接到我的电话以后，很快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平时她们二人见面时，从表面上看都很热情，这次她们见面时，表情都比较严肃。当她们进入大客厅密谈了两个小时以后，从大客厅走出来的时候，都是满面笑容。叶群一边挽着江青的胳膊，一边笑着对江青说：“你对我的帮助，使我终生难忘，听了你的一席话，真的胜读十年书，我对江青同志的感激之情无法表达。林彪同志如果知道了咱们今天的谈话，也会高兴的。”

江青俨然以保护者的身份自居，对叶群说：“这没有什么，对于你的思想认识的提高，我见到毛主席时跟主席说说。”叶群连连说：“谢谢江青同志！谢谢！”

江青和林彪虽然长期一唱一和，相互勾结，但是，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互有戒心，有时还勾心斗角。

我刚到江青那里工作的时候，林彪和江青之间的人员来往和电话来往也不少。那时，相互

打电话，有时有电话记录，有时没有电话记录。有电话记录时，江青看看，有时叫我立即烧掉，有时对我不放心，她自己亲自烧掉。那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深。1969年1月份，江青突然怀疑楼里有人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叫人把她当时住的11号楼的各个角落进行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而她还是不放心，干脆就搬到了10号楼居住和办公。从此以后，她叫我把她和毛家湾（林彪的住地）之间的来往电话内容统统地详细记录下来，并一份不丢地保存下来。当时，我对江青保存电话记录的用意不清楚，心里常犯嘀咕：保存这些东西干什么？那要增加多么大的工作量啊。后来，江青说明了她这样做的用意。她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不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叫她给绕进去了。”

1969年5月，党的九大闭幕不久的一天，外交部送来一份文件，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名单的顺序是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的，因为江青的“江”字，比叶群的“叶”字多一笔划，所以江青的名字自然地排在了叶群之后。江青看到这个名单打铃叫我，我走进她的办公室，看到地上有一份文件。她用颤抖的手指着那份文件：“你看，你看！”我不知道她叫我看什么，捡起它，拿着发愣。她急了，从我手里夺过文件，指着一行名单大声说：“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样排列是有问题的，我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这样搞的，是为了制造矛盾，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叶群的名字列在我的名字前面，是很不正常的，她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怎么能和我相比，没法比嘛！不行，我得跟林副主席去谈谈。”说完，她叫我立即打电话了解一下林彪是在毛家湾，还是在大会堂。

我了解到林彪在大会堂浙江厅。我报告江青以后，她带上那份文件，急急忙忙驱车直奔大会堂而去。

江青到大会堂浙江厅门口，因为里边早有了准备，叶群出来迎接。叶群看到江青的脸拉得很长，又不知她为什么不高兴，忙伸出手去想握手以示欢迎，没想到江青理都不理，拂袖昂头而去，弄得叶群十分尴尬。

江青进去以后，我、警卫员和护士坐在门口的沙发上等候。大约等了一个小时左右，江青高兴地 from 里边出来，和送行的叶群主动握手告别。

自那以后，无论是什么文件，只要有政治局委员的全部名单，在排列顺序上，江青的名字总是排在叶群之前。

“九一三”事件以后，江青心里有鬼，惶惶不可终日。在她身边工作的人，谁都看得出，她的神气小多了，说话也少了，饭量也减少了，经常唉声叹气，甚至对工作人员说：“我总感到我快死了，活不了多久了，好像明天就会大祸临头了。死，我并不怕，就怕把我不死不活地养起来。”

记得有一天，她正办公，我进她的办公室送急件，她接过文件，看了看，在她的名字上画了圈，把文件递给我。我转身要走，她说：“你等一下，我想跟你说一会儿话。有一段时间了，我总觉得心里有恐慌之感，有时茶不思，饭不想，睡觉的质量特别差，我从镜子里看出，我现在面容憔悴多了。你们为我服务这么久了，难道你们就看不出？”

江青究竟害怕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不过，有目共睹的是，江青开始在各种场合“控诉”林彪，把自己打扮成与林彪斗争的斗士，说她是林彪的受害者。她甚至公然说：“这几年他（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其实，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互相利用，林彪何尝打算干掉她呢！

~~~~~  
【亡灵祭坛】

田汉之死的人道反思

• 张耀杰 •

田汉是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史上最为多才多艺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兼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他富于浪漫传奇色彩的悲喜人生，本身就是中国影剧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政治史的一面镜子。本文已经在《长城》2003年第2期公开发表，特此声明。

一、“波陀雷尔的恶魔之剑”

留学日本的田汉，在最初创作的《梵峨口与蔷薇》和《灵光》两部戏剧作品中，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是以灵肉调和的至上艺术和至上情爱为救国救民、救苦救难的绝对天理和最佳手段的既要天理又要人欲、既要爱国又要唯美的实用主义浪漫文艺观。与这种浪漫文艺观相配套的浪漫人生观，就是由“做不起人”的美女佳人，“像圣母玛利亚”那样为男权人物付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殉情殉道殉艺术之类的牺牲奉献，进而与男权人物一道去从事救国救民、救苦救难的神圣事业，并充当男权强权特权甚至于全能全权的既要天理又要人欲、既要爱国又要唯美的救世“超人”。

最能够体现田汉这种浪漫文艺观和浪漫人生观的，首先是《梵峨口与蔷薇》中的“圣母玛利亚”式的女性人物柳翠姑娘：

我生平好胜，总想法子要替你也出一点力，表示我们女子也有本事，不白受人家的恩典，怎奈生不逢辰，又是个女子，总做不起人，所以非常烦闷。……我心里只盼望你成一个大音乐家，我便牺牲我的爱，和这条苦命都愿意。因为我想我若不肯牺牲我的爱，和你结婚，你又没有财产，徒然添重你的负累，你纵然有艺术的天才，也要被柴米油盐这些事把你坑死，儿啼女哭的声音把你哭死，哪里还有余力去发展它呢。加上我平常听得你说，有许多艺术家的姊妹情愿牺牲她自己助她们的兄弟成功，我也想这样做的人。

其次还有《灵光》中的女基督徒、被自己的爱人张德芬神圣化为“天生是一个艺术家”的顾梅俚：

我虽然是基督教徒，却不想学原始的基督教徒那一样，把灵魂送到天上，把肉体打入地狱。我当然不愿被你们男子看做兽类一样，专门满足你们的性欲冲动，也不愿被你们男子看做天使一样，专门满足你们的精神恋爱。一言以蔽之，我们都是人，我们要求我们人的恋爱就是了。我自己觉得有完成我自己和我们俩人互相完成的责任，但同时还觉得我们俩有使种族达于大完成的责任，我们越要做超人，这第三种责任越重，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尽前两种责任的时候，而且我恨历史的生活，我暂且舍不得我们这种罗曼谛克的生活，好！德芬亲爱的，你努力去做超人，我暂且努力做你的好朋友吧……我想我还可以做你五年的好朋友……嗟呀！这五年如何去过呢？

《梵峨口与蔷薇》和《灵光》创作于1920年。几个月后，随着舅父和未婚岳父易梅臣的遇难猝死，田汉在《梵峨口与蔷薇》和《灵光》中通过天神救星的拯救和保佑才得以实现的

艺术至上和情爱至上的灵肉调和，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他在《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中所表达的“我们不为艺术家则已，有志为艺术家，便不可不为大乘的艺术家，诚不可不借波陀雷尔的恶魔之剑，一斩此心中的执著”的“恶魔”化情绪。也就是为追求刹那间的至上情爱和至上艺术的灵肉调和，不惜高举“恶魔之剑”以灵灭肉、以理杀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情绪。在此前的《梵峨口与蔷薇》、《灵光》中，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情绪已经虚拟性、试探性地透露过杀机，此后还将在《不朽之爱》、《午饭之前》、《获虎之夜》、《到民间去》、《湖边春梦》、《名优之死》、《湖上的悲剧》、《古潭的钟声》、《风云儿女》、《胜利进行曲》、《秋声赋》、《丽人行》、《情探》、《白蛇传》、《金鳞记》、《关汉卿》等一系列的影剧作品中反反复复地表现下去。

## 二、“不能斗争的只有死灭！”

南国社时期，在一系列“我们的生活马上便是我们的戏剧，我们的戏剧也无处不反映着我们的生活”的影剧作品中，“田汉作剧，张恩袭作曲”的“一幕抒情剧”《南归》，无疑是最为成功也最具诗意的一部经典之作，就连田汉为演出而写的剧情介绍，也充满着诗情画意：

桃花快要落完的时候，母亲把女儿许给一个痴情的农家少年了。但春姑娘的心里只有那“来不知从那儿来，去不知向那儿去”的流浪者。她每天念着流浪者在树皮上刻下的诗句，每晚枕着那流浪者丢下的破鞋。流浪者终于梦影似的重来了。春姑娘自然如得异宝不肯舍掉他，流浪者疲于幻影的追求，也许永与春姑娘相守。但当春姑娘到园子里，寻菜去了的时候，母亲把困难的情形告诉他：“你早来一刻就好了。”那南归的孤鸿只好又鼓着残翼向那遥遥无际的旅途飞去了。全剧充满着诗，充满着泪。

《南归》是根据流浪诗人陈凝秋的生活经历写成的一部“话剧加唱”的浪漫诗剧，剧中不少的唱词，直接取自陈凝秋所写的诗歌。剧中通过农家少年对农家少女和农家少女对流浪诗人的肉之爱与灵之爱的灵肉错失，最终让农家少女春姑娘走上奉献情爱的神圣道路，从而许给流浪诗人辛先生一个青春做伴的美满结局：“跟他去，跟他到那遥远的地方去。辛先生！辛先生！（追去）”。

在《田汉戏曲集》“第五集自序”中，已经在《我们的自己批判》中公开宣布向左转的田汉，详细介绍了《南归》的故事：

在南国在南京第一次公演的剧目上就有《南归》的名字。简单的情节是：“写一诗人于大雪之夜飘然南归……”直到陈凝秋君第二次由哈尔滨南来，我看了他的《归程》的诗又听他对我低声细述的归后的情形，我深深的感动了，想到一年前拟写而未写的《南归》，我便决心以他为主人公而着笔了。……这是真的，没有凝秋是没有这剧本的，同时也可以说没有这剧本也没有凝秋罢。

接下来，田汉笔锋一转，对于以临场拆台的方式脱离南国社的陈凝秋的所谓“感伤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個人主义”，实施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直接挂钩的神圣清算：

《南归》以下述的演员表共演六七次以上。母……左明，女……吴似鸿女士，少年农人……张惠灵，流浪者……陈凝秋。这个演员表在南京，在无锡都没有变动，在上海也没有安排变动的，但在上演的前几点钟忽然发生了变化了，这变化的经过没有在这里细述的必要。我除感谢洪深先生与张恩袭君的献身的努力外同时也感谢凝秋，他终于使我唾弃了感伤主义了，同时唾弃了无政府主义的個人主义了。

“人生是个长的旅行。或是东，或是西，他只能走一条路。”

是的，我们既然走上一条集团的斗争的路便不应再有一条孤立的逃避的路了。……是的，在这年头的人间确是没有那种许我们好好的将养伤痕的地方，“不能斗争的只有死灭！”

而在实际上，恰恰因为《南归》是师生之间充份合作的纯粹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在集体创作的过程中既矫正克服了田汉身上以理杀人、以灵灭肉的“恶魔”化气息，又没有沾染上田汉左转后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效忠的实用主义气息，才真正称得上是田汉影剧作品中具有最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永远的经典。高喊出“不能斗争的只有死灭！”的革命口号的田汉，对于陈凝秋连同《南归》的“自己批判”，所清算和扼杀的，恰恰是自己最有价值的艺术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

放大了说，田汉1930年以《我们的自己批判》为标志的向左转，不过是把自己既往的以灵肉调和的至上艺术和至上情爱为救国救民、救苦救难的绝对天理和最佳工具，降格调整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为救国救民、救苦救难的绝对天理和最佳工具，从而走出了一条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更加实用的文艺道路。用田汉写于1946年的《招魂》一文的说法，就是“招魂”加“效忠”的文艺道路。这种降了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实用主义二元工具论浪漫文艺观，表现在影剧人物的处理上，自然就成了把自己一方的立场观点宗教神圣化，把敌对一方的立场观点极端妖魔化的阶级圣战和政治圣战。这种极端化、浪漫化的阶级斗争和立场路线斗争延伸到现实生活之中，最终必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化国家之公为一人之私、化一人之私为国家之公的登峰造极。田汉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被牺牲的殉道惨局，就是这种抢占绝对天理制高点“存天理灭人欲”的文化根性和精神癌症，被阶级斗争极端化、扩大化的政治操作充份利用并登峰造极的必然结果。

### 三、开国气象与修成正果

1949年2月1日，田汉、安娥与其他民主人士20余人，在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等人率领，乘大卡车连夜进入北平，并于2月3日参加了共产党军队的入城式，田汉在《庆祝北平和平解放》一诗中，留下了“毕竟工农新作主，天安门下扭秧歌”的诗句。

1949年6月15日，田汉以文艺界代表的身份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7月2日至19日的“文代会”上，田汉当选全国文联常委，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主席。1949年10月，田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1951年文化部机构调整后田汉任艺术局局长，1953年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田汉任剧协主席，他的党籍也经周扬亲自给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写信予以恢复。继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中国影剧界的最高军衔（少将）后，田汉再一次成为中国戏剧界的最高领导。

1949年8月，北平城里的戏改运动正式开始，在禁戏改戏的同时还组织了针对戏曲艺人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当选剧协主席的田汉，在北平戏曲界第一期讲习班上，为戏曲演员指示和包办了“艺术的道路”：

我今天看到我们讲习班老先生们和年青朋友们一道在这里兴奋的唱歌，热烈的学习，都愿意把国家人民的责任摆在自己的肩上，老年人变成年轻人，年轻人变成老成人，每人都负责，每人都有用，这真是开国的气象。……今后我们该在新的理想、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下用更大的集体力量，为保卫民族自由独立与世界和平民主而奋斗，这样你自己也吃不了亏。……苏联青年剧作家西蒙诺夫的某一作品，全国有五百戏院上演，单只莫斯科就有五家上演他的戏，他上演收入之多可想。作家如此，演员亦然。他们中的杰出的为人民服务的被称为人民艺术家。有一位演员自己有别墅、有汽车、还有飞机，他们每年演三五个月戏，到了寒暑假由国家帮助避暑避寒，这样的幸福，已经等待我们的剧作家和演员，听说有些愚蠢的朋友还在害怕蒋介石会回来，因而对于改革旧剧不起劲，甚至妨害别人的改革工作，我们还是做蒋介石这奴才的奴才的奴才呢，还是做人民艺术家呢，该做个选择了。

编造社会主义苏联的天堂神话，对于田汉来说并不是第一次。1931年1月，刚刚以《我们的自己批判》表明自己向左转的阶级立场的田汉，就在独幕话剧《年夜饭》中，借着以张式沅即安娥为原型的革命者妻子杨式渊，宣传过苏联社会主义的天堂福音：“假使在新社会的话，我们的孩子都有国家替我们去养育，家里的柴米油盐也不必我们自己去管，我们就可以腾出功夫来和男子一样的去做社会活动了。”“……这在苏联早已成了事实了。”

在某种意义上，苏联天堂的美满生活，正是因“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人非幻影不生活”的田汉本人，对于新社会、新政权的一种极端浪漫的期望与幻想；同时也是他在自传体小说《上海》所说的“任何手段的性的满足，尤其是艺术家的特权”的男权强权特权意识的一种演变。不过，这样的天堂美梦，早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时，就已经被鲁迅拆穿过：

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迅讲这段话时田汉是在场的，20年过去，始终把唯美浪漫的文学艺术与脚踏实地的社会现实混为一谈的田汉，竟然连鲁迅当年的觉悟都没有达到，也算得上是咄咄怪事。不几年后，他便为自己的这份极端浪漫的文艺理想，付出了必然性的人生代价。

#### 四、田青天的请命运动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要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界由此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上海民间职业剧团已有69家改为国营剧团，26家成为民办公助剧团。天津民间剧团和小型曲艺组织全部改为国营剧团。原本靠着文艺演出自谋生路的文艺工作者，从此变成挂靠捆绑在政治体制与政治操作之下被包办、被供养的工具与附庸。国民党时期一直在从事和提倡在野的、民间的影剧运动的田汉，对此虽不尽赞同，却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原因很简单，连他自己也成了被政府包起来的公家人。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文艺与科学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阐述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就是在这种政治气候和文化氛围中，田汉直接参与制造了“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高度政治化的戏剧事件。

早在1953年在杭州观看昆曲《游园·惊梦》时，田汉就与浙江省昆苏剧团建立联系。在田汉的支持下，昆苏剧团根据清代朱素臣的《十五贯传奇》（又名《双熊梦》）原著整理改编

了昆曲《十五贯》，遭到当地有关领导的反对与阻止，罪名是“把封建人物理想化了，……没有表现群众的力量”。

1956年初，田汉在浙江审看演出后，建议文化部安排晋京演出。1956年4月，昆苏剧团来到北京，在广和剧场进行公演，第一天只卖出40多张票。田汉一方面联合梅兰芳、李少春、戴不凡等人在报刊上大力捧场，一方面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亲临剧场观看演出，从而有了毛泽东两次观看演出，并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公安战线公开推荐的政治操作。

有了毛泽东的肯定，文化部和中国剧协于1956年5月17日在中南海大张旗鼓地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座谈会，周恩来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说是《十五贯》的改编演出，“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榜样”。会后，田汉陪同周恩来接见昆苏剧团全体演职人中时，周恩来更留下了“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经典话语。

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对于“只凭少数人的兴趣和口味，只凭主观臆测和一些若干年前的印象”来看待戏曲改革事业的“为数不少的现代过于执们”，提出严厉批评。田汉主编的《戏剧报》更以《反对戏曲工作中的过于执》为题发表社论，为“现代过于执”们戴上“轻视民族遗产的虚无主义者”和“用庸俗社会学武装起来的反历史主义的粗暴批评”的政治罪名。

纳入政治操作的《十五贯》，在伟大领袖的直接号召下，取得了在北京连演46天，有7万多人观看演出的大好成绩。就在《十五贯》演出在京城取得惊天动地大轰动的时候，田汉仿效《十五贯》中“体民苦，察民情，平生愿，效包拯”的青天大老爷况钟，与历史学家翦伯赞一道，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湖南、桂林等地视察。1956年5月22日，两个人来到田汉的家乡湖南长沙，23日以微服私访的方式，参观了“樊西巷益昌里湘剧二团宿舍”，所看到的是极不人道的生存环境：“上下两层楼房住了140个人。楼下大厅住了十几家人家。隔一层帐子便是一家。单身艺人两个人一铺。也有青年女演员住在两对夫妻的当中的。人既拥挤，地也潮湿，身体和精神的健康都不能保证。”

5月28日，田汉为了慰劳抗战时期跟随自己参加过“战时训练班湘剧队”的20多位老艺人，亲自书写请柬，邀请他们到天心阁举行茶话会，由于当天下着小雨，田汉称之为听雨会。在听雨会上，田汉了解到许多触目惊心的人间悲剧：

湘剧名演员在对日抗战中已经牺牲得十分惨烈了，罗裕廷、吴绍芝、欧元霞、胡普林们都成了国殇，给湘剧界造成了难以补偿的损失。彭凤蛟才老先生和名净罗元德都是硕果仅存的前辈，这次却看不到他们了。彭先生70多岁了，年老家贫，还有一位老妻，无以为生，曾在街头卖过两年蚊烟草纸，日子过不下去，一度自杀未遂。文化局知道了，津贴了他一些钱，但不解决问题。他又不愿多向人求告，终于自杀了。其后又有罗元德，唐华政，秦连哈，陈炳奎，陈新燕的事。

最为严重的情况还在于，空前绝后的禁戏运动导致了一大批戏曲演员的无戏可演和无以为生，正如老艺人周圣溪所说：“几年来政治学习，大家都有了进步，艺人思想好了八成，只有两成余气。要求多有些真懂得湘剧的人帮助艺人把剧本改好，把艺术提高。艺人也改过一些本子，就是拿上去便如石沉大海，不知要得要不得。这倒比没有饭吃还苦。”

社会主义改造还造成了市属私办公助剧团湘剧二团与端着铁饭碗的省属国营剧团湘剧一团之间的贫富悬殊：“湘剧艺人一般的生活待遇低到每月15元、18元。最高的也不过32、3

3元（国营湘剧团高的到120元，但技术上并无甚高下）。这些艺人说：‘湖南谷米比较便宜，我们也还不致饿饭，但不能生病，一生病就只能拼着性命去拖。’”

在桂林期间，田汉见到的情况并不比长沙好多少：“不止一般演员住得很苦，有名的桂剧武生小兰魁夫妇和名旦玉芙蓉都住得很苦。玉芙蓉为我们演了神话剧《金精戏仪》，她是一位值得人民珍视的女艺术家，……我们去访问她的时间玉芙蓉正在进午餐，只有一样菜——辣椒粉拌苦菜叶。她苦笑着让我们拍了一个照。人们劝她少吃辣椒，免得坏嗓子。但她说：‘不吃辣椒叫我吃什么？’”

针对这种情况，田汉借着周恩来的话头道出了由各级政府包办戏剧所造成的包而不办的可悲事实：

周总理曾经指出浙江昆苏剧团“在解放后也还是受压迫的”。当然在解放后不见得还有人当真正压迫一个剧团，但由于党和政府在人民中有极高的威信，我们注意什么，什么就得到提倡；我们不注意什么，什么就得不到改善和发展，这常常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压迫”。

比起当上戏剧界的政治高官的田汉，借着周恩来的话头才敢于吞吞吐吐说出来的请命话语，1935年还是一名保释后被监视居住的政治犯的田汉，在《对于戏剧运动的几个信念》中公开发表的，才真正是自由民主的肺腑之言：

艺术运动的奇花是应该在狂飚般的运动中生长的。因此它将是野生的，属于民众，为民众，由民众的。有人说过去民众的戏剧运动碰壁了，现在该由政府来包办了，似乎戏剧运动的基础应建立在政府上。我想这是本末倒置的话，从来“民为邦本”，没有民众到处碰壁而政府单独干得起来的。救国运动如此，戏剧运动也如此。（1935年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

像这样开诚布公的肺腑之言，建国后的田汉再也没有说出过半句，他所说的每一句还算真诚的请命话语，几乎全都被精心包装在这样那样的政治安全套之中。

回到北京后，田汉把一路视察到的情况写进《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一文，发表在《戏剧报》1956年第7期上，同时还向中央政府写出相应的汇报材料。随后，田汉再一次到南方出差，从合肥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一路上宣传贯彻“双百”方针。再一次回到北京时，田汉的调门升得更高，下一篇文章的题目干脆叫做《为演员的青春请命》：

在上海一次演员座谈会上，我听到好些女演员像孩子似的痛哭。……问题在于今天她们的才能应该得到更好的发挥的，却因为领导上缺乏对演员的更细致亲切的关怀，把她们搁置在那儿好些年没有适当的使用，每天的宝贵光阴消耗在按时上班看书，看报，聊闲天，开没有完的无谓的会，干业务以外的一般琐碎工作。……这个问题和广大艺人的生活问题一样必须迅速获得解决。

党号召全国各方面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来从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在艺术方面每每不免把一些原来积极的因素，由于使用率低，或不使用，或使用不当，而变成消极因素。这是与党的精神和人民的利益不符合的。艺术领导是十分细致的事情，我们一定得终止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一定得消除演员们不应有的叹息和眼泪。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大会闭幕前一天，毛泽东莅会作长篇发言，强调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党整风逐步展开，并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进行整风。一时



间，有“引蛇出洞”的“阳谋”之称的大鸣大放辩论进入高潮。

一直喜欢凑热闹、出风头的田汉，自然少不了到处点炮。1957年4月在陕西视察期间，他对“孤立地强调演现代戏，而不去学习遗产”提出批评；5月28日在剧协与美协联合召开的舞台美术界鸣放会上，他甚至有“我们要过的是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然而，这里却是一种非人生活，这是不能容忍的！”之类的表态发言。

就在田汉鸣放得高兴的时候，形势直转急下。6月8日，由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以中央名义向党内传达，说是“要组织每一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导，……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后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根据这一指示，戏剧界的反右运动从吴祖光身上打开缺口。为罗织吴祖光的罪名，有人擅自把他大鸣大放中在文联座谈会上一个发言摘要，加上一个上纲上线的大题目——《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在《戏剧报》第14期发表。已经被内定为反右对象的田汉，也在剧协内部整风中受到了批判与围攻，后经周恩来与周扬出面拯救和解围，才算逃过一场劫难。

## 五、政治漩涡中的殉道效忠

1962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以小说《刘志丹》为由头，对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进行清算，毛泽东由此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说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自以为“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的田汉紧紧跟进，一连写出“于今百鬼犹多事，喜得钟馗试剑图”；“何处借得猴王棒，打尽人间白骨精”等一系列替天行道的“斗争”诗。

1963年1月1日，有毛泽东“好学生”之称并有替代周恩来总理地位之意向的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市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强调只有写十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才算得上是社会主义的文艺。接着，柯庆施、张春桥又与第一夫人江青联手策划了一个大动作：从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由中共华东局在上海主办的华东地区五省一市话剧观摩会演。

会演之前的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在中宣部编印的一份关于“上海柯庆施大抓故事会活动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针对文艺界问题做出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七天之后，被伟大领袖定性为“死人”的田汉，主持召开剧协第四届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同样被定性为“死人”的周扬到会打气，肯定了剧协的工作和创作现代戏、新编历史剧、整理传统戏“三并举”的既有方针。会后，田汉以剧协主席身份前往上海参加华东区话剧观摩会演，来到上海时开幕式已经举行过了。

与毛泽东的指示相呼应，柯庆施在开幕大会上发表讲话，认定“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把柯庆施所说的“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揭穿了说，就是直接在伟大领袖支持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的柯庆施们，与自以为“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却被伟大领袖定性为“死人”的周扬、田汉们之间的斗争。在这样的“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中，被伟大领袖定性为“死人”的田汉和周扬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国传统儒教神道中三纲五常的第一纲：“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也就是田汉影剧作品中一再表现的高举“波陀雷尔的恶魔之剑”以灵灭肉、以理杀人的殉道殉情殉艺术殉政治殉阶级斗争的殉葬牺牲。

上海方面迎接田汉的，正是这种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柯庆施在“新年贺词”中把斗争矛头直指田汉，说是“反对派以‘三十年代’祖师爷自居，公然向‘大写十三年’的革命创举提出挑战，……戏曲舞台一直是‘牛鬼蛇神’泛滥成灾。什么斧劈华山、水漫金山，公然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里应外合，紧密呼应！”姚文元也曾当众警告田汉：“不要挡社会主义的道嘛！”

几天后，大会秘书处传达上级决定，闭幕式主席台上没有田汉的座位，还要对田汉公开点名批判。周扬得到消息后，专门委派张颖到上海劝走田汉。田汉按照周扬的指示，于1月22日闭幕式当天离开上海前往苏州，在苏州司徒庙以一首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司徒庙古柏》来表白自己的殉道效忠之心：“裂断身腰剩薄皮，新枝依旧翠云垂。司徒庙里精忠柏，暴雨飘风总不移。”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剧协已经无权参与，改由康生、江青等人直接插手。在7月31日的闭幕总结大会上，周恩来、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沈雁冰出席助阵，已经被毛泽东定性为“死人”的周扬、田汉、阳翰笙也被请上主席台。康生在大会讲话中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点名批判田汉、阳翰笙、孟超等人，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及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逆风千里》统统打成“大毒草”。坐在台上的田汉与阳翰笙的狼狈相可想而知。从这一天起，田汉再没有坐上过领导别人的主席台。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江青以山东省人大代表身份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已经被撤销剧协党组书记的剧协主席田汉，与他的老朋友阳翰笙一道被免去人大代表资格，只作为政协委员参加会议。此时的田汉依然不情愿、不甘心殉道牺牲，而是与自己笔下的许仙、张珍、鲤鱼精、关汉卿、朱帘秀那样，开始全方位地寻找救星。

1965年1月2日，在参加由周扬主持的文艺界两会代表联席会议之后，田汉在日记中写道：“上下午都是大会讨论。下午的会总理也参加了。张骏祥同志代表文联小组发言时，总理很注意地听了，他显然对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十分关心。我真是愧对总理，我一定要切实改正错误急起直追，跟上队伍，以告慰这些关心我的同志们。”

在政治上寻找“救星”的同时，田汉自然忘不了自己在戏剧中虚拟性地表现过的一边“为民请命”一边又“民为请命”的“民”，结果却是适得其反。1月3日和4日晚上，在周扬主持召开的文艺界两会代表座谈会上，田汉受到的是“民”的集体围攻和集体强暴。据田汉日记介绍，红线女讲得“较为适当”，丁是娥讲得“很尖锐”，总的印象是“她们都恨我”。一个南国时代的学生还翻出田汉的老帐，指明《湖上的悲剧》也是一出“鬼戏”。田汉在认定此人“很不老

实”的同时，却连《湖上的悲剧》中确实存在着的鬼气都不敢承认，一口咬定“不是写鬼，而是写人”。

1965年6月9日，被伟大领袖定性为“死人”的田汉，又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段话效忠话语：“沉催我快点把检查写好，我也深觉应抓住主要矛盾。应‘勇于自以为是’，何况本有许多严重的非。一面决心读主席的书，听主席的话，就从解决自己思想改造问题上活学活用主席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 六、在劫难逃的人生末路

1965年8月30日，田汉把修改后的“检查”交了上去，10月20日，他得到的回报是带着秘书黎之彦下放到顺义县牛栏山劳动改造。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1966年1月，原本由田汉主编的《剧本》月刊上，推出了署名云松的一篇长文《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文章于2月1日和2日分别被《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转载，田汉的弥天大罪在《光明日报》“编者按”中已经被基本敲定：

田汉同志的《谢瑶环》剧本，是在1961年写出的。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获得伟大发展的同时，曾经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联合封建残余势力，趁机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鼓吹什么“三自一包”，“单干风”、“翻案风”，诋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诋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正在这个时候，田汉同志在这个剧本中，用编造的历史故事，积极参加了对社会主义的进攻。

比起云松的文章来，何其芳随后发表于《文学评论》并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的《评〈谢瑶环〉》，显得更为权威也更有来头，文章一上来便把田汉钉在了“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十字架或者说是耻辱柱上。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天夜里，毛泽东下达最高指示，要求向全国全世界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贴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第二天，《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聂元梓的大字报，并配以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人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一时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传遍了有“神州大地”之称的大江南北。

1966年7月，田汉和文化部、文联系统所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大小官员，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过起集中营生活，从田汉7月7日的日记来看，他一开始采取的就是合作态度：“每天6点钟起床，6点50分早饭，8点开始政治学习，这里的政治空气浓厚，对我的改造极好。”韦君宜在《思痛录》中，为后人留下了一段更加真实的回忆：

我们那个社会主义学院只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即除了看管的军宣队之外，全体都是各单位送来的黑帮。大家互相揭发，骂起来当然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而自己是“上当受骗”。我记得很清楚，林默涵的名字被用大字歪七八扭地画成一只带毛的大狗，真正是一点不错的歪曲。……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称他为“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但是，光是这样黑帮自斗，只用笔诛，还是不彻底。于是宣布解散，叫各

单位自己领回去斗。

被剧协“领”回王府井文联大楼的田汉们，所受到的“斗争”就不再限于“触及灵魂”而常常要触及肉体了。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经卫兵后，停课闹革命的红卫兵得到了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最高授权，从而摆出比田汉《谢瑶环》中的“吊民伐罪”更加权威也更加神圣的卫道嘴脸，全面介入了对于“牛鬼蛇神”的打斗之中。知名度最高又最不禁斗的文联系统，就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一时间成为鬼哭狼嚎之地，被伟大领袖亲自定性为“死人”的田汉等人更是首当其冲。张光年对此的回忆是：“我同田汉同志最后一面，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某一天，在王府井大街当时的文联大楼大礼堂中，我和田汉及别的几位难友被‘革命群众’揪斗的时刻。好容易我从台上被下来了，从身后传来‘打倒田汉’的怪吼声。回头一望，从额头沿鼻梁两边流淌鲜血的田汉同志，像平常那样挺直腰杆，迈着快步，穿过人群走上台去。我不忍多看……”

发生于1966年12月4日深夜的“活捉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的政治事件，是“文革”中最大规模的一次逮捕行动，遭到“活捉”的并不是小民百姓，而是与小民百姓一样没有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的大人物，这其中就有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这些人被捕后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秘密监押，根据需要用车拉出去轮流批斗。

1967年2月17日，田汉等人被关入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这期间还成立过一个由军人组织的田汉专案组，归中央专案组直接领导。1967年7月，田汉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化名李伍送进301医院，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接受审讯，于1968年12月10日病逝于医院。终年70岁。

由田汉当时所写的有《田汉自传》之称的“检查”，可以折射出被钦定为“死人”的田汉并不复杂的案情：

一、我不是“反共老手”，我若是反共老手，就不会保共产党员黄日葵出狱就医，就不会在西南大撤退中救护一些党员和他们的家属，也不会引进一些音乐、戏剧工作者加入党。1936年在南京是我主动要搞戏剧流动的，不是怕死，那时候我并没有死的威胁。……我若真“大写反共剧本”，上海的戏剧工作者不会到南京来帮助我演出，早已唾弃我了。总理到南京也不会接见我。

二、我不是“特务”。国民党没有从我嘴里和笔下得到过任何东西。他们曾诬蔑我供出了周伯勋和赵铭彝，后来都证明毫无根据（见文化部审干调查）……

田汉死时，专案组没有通知家属。在家中等他归来的，是年届百岁的老母亲易克勤。

早在1919年甚至更早，易克勤就见到过毛泽东，当时的毛泽东找到她的家里，想托正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帮助买书。1933年，易克勤又认识了原名李云鹤的江青。李云鹤早年投靠著名戏剧家赵太侔、俞珊夫妇，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小职员，后来与俞珊的弟弟、中共地下党员俞启威即后来的天津市长黄敬同居。俞启威神秘失踪后，李云鹤经俞珊的介绍来到上海，最初就是投靠和田汉门下混饭吃的。吃过老太太亲手做的大碗湖南菜的李云鹤，此后以艺名蓝苹混迹于大上海的影剧界，到延安后才改名为江青。

易克勤的小儿子田沅田寿麟，于1938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在南征北战中得了癌症，1949年5月25日在北京与田汉重逢时，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临死时留给田汉的，只是一份政治遗言：“哥，我现在真是脱胎换骨了……我在延安经过严格的整风，在整风过程中，

我不知有多少晚不能成眠。现在我的思想方向总算搞准了，不会犯什么大错误。”在给母亲留下的遗书中，他所要表白的依然是一句“妈，儿现在是脱胎换骨的人了。”（田汉《一位革命战士之死——哭五弟田沅》，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1971年11月是易克勤的百年寿诞，她远在湖南的右派儿子田洪，经多方争取才被组织上批准到北京给母亲拜寿，神智清爽的老寿星并不知道大儿子已经死在狱中，她嘱咐田洪的是：“你先要……报个临时户口，在我那房间开个铺，等寿昌回来我们一道吃饭，我们娘崽好久没有在一起了。”

不知道这位为中国的影剧事业做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和牺牲的百岁人瑞想到过没有，自己的小儿子已经以特殊材料的身份为新中国新社会殉职献身，为新中国新社会“招魂”和“效忠”几十年的大儿子田汉，为什么偏偏不能也不愿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公民和普通公务员的身份，在伟大领袖领导下的新中国和新社会里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呢？！

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个影剧作家，能够像田汉那样，高举所谓“波陀雷尔的恶魔之剑”，循着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直至“存天理灭人欲”的大框架、大圈套以灵灭肉、以理杀人，从而写出上百部以弱小弱势的男女人物殉情殉道殉艺术殉国家殉政治殉阶级斗争为代价，来追求既要天理又要人欲、既要爱国又要唯美的号称是“灵肉调和”的影剧作品。到了这时候，在田汉影剧作品一再轮回重演的“灵肉调和的理想+爱国唯美的招魂+以理杀人的效忠+天神救星的拯救+天理人欲的两全”的情节模式，已经变成一个无论如何也要以田汉本人的殉道牺牲为代价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死结。

田汉之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并不是一例孤证，铁的事实是，包括左派人士在内的国人，所受到的最为直接也最为惨烈的迫害与斗争，绝对不是来自于国外的殖民侵略者和国内的阶级敌人，而恰恰是来自于新一轮又一轮、一茬又一茬抢占“存天理灭人欲”的强理强权制高点以理杀人的老左派与新左派的革命同志与革命斗士。田汉之死连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说到底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极其原始野蛮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直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文化根性和精神癌症，在政治操作下登峰造极的结果。以拥有绝对天理或唯一真理的特殊材料自居而“存天理灭人欲”的田汉连同他的革命同志，正是自己连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掘墓人；出自田汉的手笔的“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的国歌，就是迄今为止依然在祸国殃民的一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大圈套和大墓坑。

旧事重提，但愿先驱者田汉所遭遇过的中国特色的革命悲剧，能够就此打住并永不再来。

□ 原载《新世纪》网站

附： 生不惧丑死求美——田汉的最后日子

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田汉唯一能见到“外面的世界”的机会，是当他被拉出去在群众大会上被批斗之时。有一次批斗会在故宫举行，田汉被押上当年供慈禧太后看戏的戏台上接受那些粗野的围攻和辱骂。那次批斗使他感慨万端、痛苦难言——“我一辈子搞戏，视戏剧艺术为生命之一部份，如今竟在戏台上受辱！”“我的戏剧生命是1920年在东京著名的‘有乐座’舞台上开始的，难道在1967年就结束在这故宫的戏台上吗？”他顿觉一生成空白了。这是精神上的虐杀，其残酷远在皮肉折磨之上！

大抵在1967年初，一个由军人控制的“田汉专案组”成立了。从此，在那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田汉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接受专案人员的审讯和逼供。他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席，当专案人员逼他承认那些捏造的罪名时，他唯一的办法是“从头说来”，详述当时的事实。由于述之甚详，且多有细节的描写和形容（写的“交代材料”也如小说一般），以致专案组中有的善良人都为之感动，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是一位善于“形像思维”的艺术家。

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田汉病倒了。糖尿病、肾病和心脏病一起爆发。他被送进301医院“将军楼”。病历上的名字是“李伍”，医护人员不知道他就是田汉，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要犯”，日夜有卫戍区战士看守，不时有人来审问、逼供。

1968年12月最初的几天，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田汉最想念的是母亲。他有时沉吟着：“放我回家见见我妈妈吧！”极度痛苦之中，他常常似梦非梦地想到自己的一生，想到自己的亲人们，想到死。专案组已经告诉他，他的案已定，是“叛徒”、“特务”。这诬陷使他死不瞑目。他想挣扎着活下来，争一个“清白”，争一个“是非”。

他想念母亲，想喊“妈妈万岁！”他想念安娥，想念几个已成人的儿女，也想念林维中，还想念那被打成“右派”，如今也在被审查的弟弟田洪和他的一家……他觉得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兄，都很对不起他们，觉得欠了他们大笔大笔的亲情之债。他希望母亲能活一百岁，可惜不能亲自为她老人家做百岁大寿！

他想几位已故的艺术上的好朋友：聂耳、张曙、冼星海、任光、洪深、欧阳予倩……如果死后真有灵魂永在，能在“另一世界”与他们再度进行那令人愉快、充满创造精神的艺术合作吗？

面对死神的到来，田汉忽然想到1927年在艺术大学的历史，告别善钟路校园的最后一夜，他说过一句话：“艺术家不妨生得丑，但不可死得不美！”

1968年12月10日，在寒冷的北京，在监狱般的301医院病房内，田汉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悔恨死去了。一件大衣，一副眼镜和其他几件衣物摆在病房里，没有人来取。没有亲人和朋友来与他告别。

然而鬼使神差一般，当田汉离开人间之时，广播里正响着一首人们十分熟悉的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

这不就是三十四年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吗？1968年12月，当时正进行着“文化大革命”，当权者播出这首歌，大概是为了鼓励那些狂热过后的青年学生，沿着他们的极左路线去“继续革命”。但不管怎么说，《毕业歌》毕竟是为田汉送行了！

田汉之死是暗暗的死。全中国、全世界的文学艺术界和戏剧界人士，无人知晓。“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鲁迅语）但是，这《毕业歌》的送行，却是一次最美、最艺术的告别和悼念。

□ 摘自《田汉传》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